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文库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 运转关系研究

(修订版)

张皓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文库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 运转关系研究

(修订版)

张皓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张皓著.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15798-8

I. ①派…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国民党—派别—政治斗争—关系—国民政府—研究 IV. 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357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
(修订版)
张皓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798-8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定价:65.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修订版)编辑委员会

顾 问：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杨共乐

副主任：李 帆 易 宁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东平 宁 欣 刘林海 汝企和
安 然 张 升 张 皓 张荣强 张建华 侯树栋
姜海军 耿向东 唐利国 郭家宏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修订版)

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是中国高校中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师大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06年,历史学系又与史学研究所联合组建成为历史学院,北师大历史学科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在百余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梁启超、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范文澜、侯外庐、柴德赓、白寿彝、何兹全、赵光贤、龚书铎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科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业已形成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又有一批崭露头角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数十部著作构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八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八卷本《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以及《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上博简〈诗论〉研究》等巨著,皆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我们组织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历史学院教师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整体学术水准。目前,该文库已陆续出版专著数十部,有些作品在学术界甚至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反响,极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进步。鉴于该文库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并考虑到其中的一些高质量专著在出版数年后接近售罄的现状,我们决定从文库中精选若干部予以修订再版,以回报一直以来关注本文库的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以及此次该文库精选本的编辑出版,都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修订版)编辑委员会

2014年6月

前 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了解国民党政府最容易的办法,“是首先要决定所谓政府只是国民党的掩护体,国民党的政治和派别才是决策的主要因素”^①。因此,本书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角度,探讨1928年至1937年五院制国民党政府的运转。在探讨之前,需要对国民党派系的形成和划分作一个交代。

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派系,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去世前后。孙中山去世前,国民党以是否赞成国共合作为标准,分成左右两派,廖仲恺等人为左派,胡汉民等人为右派。孙中山去世后,左右派的划分明显地同权力争夺交叉在一起。汪精卫以“左派”领袖自居,孙科、谭延闿等也以“左派”面目出现。胡汉民承认说,“本党改组以来,党内派别如雨后春笋”,“统一的中国国民党,至少分裂为二派以上”^②。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左右派的划分进一步明显。首先在1925年8月,右派制造了廖仲恺惨案。接着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产生。根据该派骨干分子邹鲁本人的叙述,当时“西山会议

①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② 胡汉民:《武力统治迷梦者的法西斯蒂运动》,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二辑,广州先导社1936年编印,第128页。

的角色”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季陶、沈定一、邵元冲、叶楚傖、邹鲁、吴稚晖、邓泽如、茅祖权、傅汝霖等人^①，此外尚有谢持、张继、许崇智等人。这些人物从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上来说，可以统称西山派。但是从国民党内部关系来说，则很难说，比如，林森与每个人的关系都较好，邓泽如、邹鲁等人与胡汉民关系较好，戴季陶、吴稚晖等人支持蒋介石，傅汝霖等人支持汪精卫。

在这复杂的斗争中，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挤进了国民党最高权力阶层。他首先利用廖仲恺惨案，赶走了粤

旧同志之间”自今以往“不得再有以派别自居”^①，但是派系之间的划分与斗争更加明显。先是蒋介石、胡汉民两大集团合作，打击汪精卫集团和桂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等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接着，蒋介石、胡汉民分裂。随着胡汉民 1931 年 2 月被蒋介石扣押，宁粤对立，孙科派从胡汉民集团中分出来而形成，胡汉民集团基本瓦解。到此时，国民党派系划分的基本情况如下：

其一，派系林立。国民党明显形成了蒋介石政治军事集团、汪精卫和孙科两大政治集团以及一些军事集团。

在汪精卫集团中，按照蒋介石所抨击的，“陈公博、郭春涛、顾孟余一班人是无耻的官僚政客，柏文蔚、张发奎是有名的军阀，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等是有名的无赖，陈树人、许德珩、施存统是一班无行的文氓，萧淑宇等是一班惯于变节卖友的青年”^②。

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属于孙科系统的大约有一二十人^③。孙科派亦称“太子派”、再造派，西方称它为“自由主义派”，主要人物有马超俊、梁寒操、陈友仁、傅秉常、陈策、吴经熊、钟天心、王昆仑、周一志等。

至于西山派，如果说还存在，其主要人物为居正、覃振、邹鲁、茅祖权、傅汝霖、许崇智等。不过，他们亦可称为元老派。另外，于右任、戴季陶等也为元老派的代表人物。

在军事集团中，同蒋介石一度或长期争夺中央政权的有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陈济棠集团等。在 1930 年中原大战后，冯

①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 517 页。

② 《改组派之真面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1929 年 11 月编印，第 55—56 页。

③ 参见翊勋《蒋党真相》，读者书店 1948 年版，第 133 页。

玉祥系基本瓦解,阎锡山系无力再同蒋介石较量,只有桂系还有力量。1936年两广事变后,陈济棠集团也基本瓦解。

其二,派中有派。

最为典型的是蒋介石集团。它大致可分为三大派系。其一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为核心的CC系,骨干分子有张道藩、谷正纲、谷正鼎、萧铮、胡健中、余井塘、程天放、高信、洪兰友、黄少谷等。其二是新政学系。它的成员复杂,一些学者认为“包括王宠惠、张君勱、蒋梦麟、蒋廷黻等知识分子,蒋百里、陈仪、黄郛、张群、熊式辉等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钱永铭、张嘉璈、陈光甫、吴鼎昌等江浙系实业家与银行家”^①。不过,黄绍竑、沈鸿烈、王世杰等也应在内。新政学系前期核心人物为杨永泰、黄郛,后期为张群。其三是黄埔系。从广义上来说,该系指黄埔军人集团。虽然它的划分非常复杂,但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何应钦军人集团,包括顾祝同、刘峙等人。他们虽然“一向资格老,地位高,是国民党军方最有影响的人”^②,但并不真正掌握军权。另一派就是狭义上的黄埔系,一般认为它有两个代言人,即陈诚、胡宗南,骨干分子有康泽、贺衷寒、邓文仪、戴笠、桂永清等。CC系、新政学系与狭义上的黄埔系不同,前两者虽然“没有具体的组织章程、纲领,没有加入该系统的条件、仪式,以及召开会议,进行组织活动等等”,但是在国民党内“自成体系,互相提携,协调行动”^③。而狭义上的黄埔系如果指复兴社,则有组织纲领及活动。

① 寇维勇、陈浩:《透视党内派系》,台北联丰书报社1985年版,第35页。

②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中国的惊雷》,端纳译,第112页。

③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载章伯锋统编:《内忧外患中的蒋家王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在对国民党的派系作一个基本交代后,笔者还要对本书的研究,作几点说明:

第一,国民党人声称:“我们的政府称作‘国民政府’,并不称作‘国民党政府’”,因为“我们的党,只在政治上行使人民的政权,并非在法律上规定党为如何表现全国人民的”^①。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定名为国民党政府,因为只有这个名词才能包括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机构和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两大部分。国民政府有三种含义,其一是指国民党于1925年在广州所成立的政府,两年后迁至武汉,另外还包括国民党各派合流以前蒋介石在南京单独成立的国民政府。这些都属于地方政府,前面应冠以地名以示区别。其二是指数国民党合流建立的、直到1948年行宪为止的中央政府全部,这时是外交上承认的中国政府,应称为国民政府。如果仍然称为南京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则可能误解为地方政府。其三是指数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其直属辅佐机构而言,不能称为国民党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国民政府的确是“国民党政府”,在记述国民政府的活动、制度及机构情况时就应称国民政府。如果定名为国民政府,则从政治学的角度,只能论述国民政府机构,就把国民党“以党治国”、解决党政关系的工具中政会排除在外了,也把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上所没有的、实际上却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的南昌行营、侍从室排除在外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

第二,政府机构运转的含义,是政府机构如何工作的,它包括一个机构内部各级组织机关的工作程序。如总体上的行政院的运

^① 胡汉民:《党治的政府》,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四册,第942页。

转状况,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的运转状况,各部会所属各司署的工作状况,等等。虽然对各级组织的研究很有必要,但是由于本书的篇幅、框架、字数、资料等等限制;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探讨,只能从总体上探讨一个机构的运转。

第三,虽然本书集中探讨 1928 年至 1937 年间的国民党政府的运转,但是在必要时跨出这一阶段。

第四,本书涉及的一些机构,尽量采用简称。主要有: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简称南昌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简称侍从室。司法行政部,简称法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五院制国民政府的成立	1
第二章 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中政会	10
一、中政会的恢复及其法律地位	10
二、中政会变成各派争夺的目标	18
三、蒋介石权力需要下的中政会	23
第三章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演变	38
一、1928 年之国民政府组织法	38
二、1930 年与 1931 年之国民政府组织法	44
三、1931 年之国民政府组织法	47
第四章 截然不同的行政首脑和国家元首	52
一、谭延闿：虚有其名的行政首脑和国家元首	52
二、蒋介石：名实相符的行政首脑和国家元首	62
第五章 林森与虚位元首	75
一、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75
二、林森在元首任上的作为	80
三、虚位元首制运转之特点	90

第六章 各具特色的“责任内阁”	96
一、孙科:短命的“内阁总理”	96
二、汪精卫:“政治病”的“内阁总理”	117
三、“责任内阁”运转的实质	145
第七章 孙科与立法院的运转	150
一、国民党政府何以突然要起草宪法	152
二、宪草何以一稿不如一稿	158
三、《五五宪草》何以变成儿戏	170
四、从《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看立法院的实质	180
第八章 居正与司法院的运转	186
一、居正权力的消长	186
二、司法院空空荡荡	190
三、“旧习与新制不能相应”	203
四、司法院运转的实质	218
第九章 于右任与监察院的运转	222
一、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	223
二、独特的监察权	230
三、心有余而力不足	240
四、弹劾权被“修正”	246
五、监察院“有口说话,无权办事”	256
第十章 戴季陶与考试院的运转	259
一、考试院的设置与戴季陶出任院长	259
二、戴季陶力争考试院的权力	263

三、考试制度的规范化·····	270
四、对国民党派系官僚政治的无奈·····	281
五、戴季陶的失望与去职·····	291
第十一章 蒋介石与其“口袋子”权力工具·····	294
一、太上政府——南昌行营·····	294
二、内廷机构——侍从室·····	336
结 论·····	353
一、国民党所谓“以党治国”变成了 蒋介石的独裁“治国”·····	353
二、蒋介石建立的独裁政治体制·····	358
三、各派对于蒋介石独裁权力的臣服·····	362
后 记·····	367

第一章 五院制国民政府的成立

国民党激烈的派系权力之争，可以追溯至对孙中山地位的争夺，五院制国民政府正是在这争夺中成立。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无人能及。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总章，明确规定“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①。这表明，孙中山作为总理，其权力凌驾于国民党中央之上，可以改变国民党中央做出的任何决议。

孙中山在世时手下有三大助手，即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胡汉民任大本营秘书长，负责大本营的日常事务，并在1924年下旬孙中山北上时代理大元帅；廖仲恺任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抓实事；汪精卫跟着孙中山，为他起草电文、宣言等。这时，蒋介石连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还未挤进最高权力阶层，权力之争主要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之间展开。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想填补，但都无力填补。汪精卫坦白说：“因为总理（即孙中

^①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32、522、516、25页。

2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

山)是有很长久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事业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领导的,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总理逝世之后,本党不复有总理了;推之以党治国的理论,则国家亦不复有元首了。”“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无论在什么团体场合,都不许有一个领袖。”^①为了解决权力之争,只能实行集体领导制,改组大元帅府。胡汉民不得不表态说:“大元帅职权,实不当再行代理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其他国民党人当然“统统赞成”^②。

因此,虽然孙中山在1924年1月就向国民党一大提出“立即将大元帅政府变为国民党政府”,但是“一时未能筹备成立”^③;只有在这种“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到来后,大元帅府才不得不改组。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即中政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公布,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组织法明确规定实行委员制,“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定常务委员5人,处理日常政务”^④。虽然于委员中推选一人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但他除了主持会议、对外代表政府和执行委员会议通过的决议外,没有什么特殊权力。公布法令和其他文件时,必须由主席和主管部长联名签署才有效;不属于

① 梦华:《改组十年》,载《人民评论旬刊》第1卷第2号,1933年4月10日,第7、12页。

② 胡汉民:《悼谭组菴先生》,南京《中央日报》1930年10月3日。

③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